

# <梁英明印尼生活回忆> 之八



1955年4月，雅加达市民和爱国华侨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游览市容

岗位,参与各种公开合法的活动,积极促进中印(尼)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交往,同时尽力维护华侨工商业及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条线的人主要在各地华文学校工作,以培养更多爱国青年学生。同时减少大型的群众活动,尽量淡化政治色彩,积蓄力量,争取长期发挥作用。

根据当时需要,我和黄天美都被安排在二线工作。因此,我除了继续担任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秘书以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巴中的教学工作上。华校教师公会由雅加达各华校教师组成,采取团体会员制。初期由杨新容老师任主席,杨老师归国后,由刘耀曾老师继任。教师公会的工作包括维护华校教师的合法权益,争取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增加教师的福利,使教师们得以安心工作,同时协调各校的师资力量,帮助安排巴中、华中等校高中毕业生分赴印尼各中小城市华校任教,等等。

由于总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发生变化,一些我熟悉的领导人纷纷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一些重要华侨社团担任领导职务,并曾在“八月大逮捕”中身陷囹圄,也许他们在新形势下已经不方便继续出头露面工作。我感到他们被迫离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一些长期与我共事的领导人也不告而别,悄悄回到祖国,却没有给我们留下的人有任何交代。这自然

使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甚至似乎有被遗弃的感觉。

我和黄天美在巴中工作五年,但是回国升学的想法始终不曾放弃。我的父亲并不了解我的具体任务,只是希望我早些回国升学,因而不断向司徒赞校长求助。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回国升学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了。

## 亚非会议

我和黄天美经过多次请求和家长的努力,终于在1955年争取到回国升学的机会。但是,我们在动身回国以前,还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即在亚非会议期间参与保卫周恩来总理安全的工作。

4月初,雅加达的侨胞们就开始为迎接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而忙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印尼华侨欢迎的第一个最高规格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特别是当我们得知这个代表团是由华侨最敬仰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的时候,都感到无比激动。在中国使领馆的领导下,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称为支援委员会,下属两个分会,即雅加达分会和万隆分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代表团准备安全的住处、膳食、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等。代表团的住处和交通工具是由华侨无偿提供的,连每天需要的蔬菜、肉类和牛奶等食品都是由华侨

专人负责购买和运送。然而,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要保证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绝对的人身安全。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的外交处境是很不利的。当时,在出席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其他国家的政治立场各异,有些国家对中国还怀有疑惧甚至敌意。各种情况表明,帝国主义及各种敌对势力很有可能对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采取暗杀行动。因此,中国一方面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加强对中国代表团的保卫工作,同时发动华侨采取防范措施。为此,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洪渊源先生首先会晤了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要求政府当局加强警卫,并表示中华侨团总会可予以协助。阿卜杜尔·加尼当即同意这一意见。

巴城中学和中华中学的师生参加了在雅加达机场保卫周总理的工作。我们的任务首先是保障周总理抵达雅加达机场时的安全。由香港起飞的克什米尔号飞机在临近印尼海域时发生爆炸的事件,使中国感到十分震惊,也使华侨对周总理的安全深感担忧。后来虽然知道飞机上只有一些准备采访亚非会议的中国和外国记者,周总理并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但是大家还是担心周总理到印尼后的安全。

周总理到达雅加达的当天一清早,我们几千名师

生就在飞机场外集合,我们手拉手地站在马路两旁,把群众挡在身后。但是附近的房顶上以及树上也都有许多人,这一情况当然给我们的保卫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由于周总理乘坐的飞机从仰光延迟起飞,中途又在新加坡机场停留,因此飞机到下午才抵达雅加达。这期间,同学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一直守候了好几个小时。当陈毅副总理和黄镇大使等保护着周总理坐进了汽车后,欢迎的人群都围在汽车四周,汽车无法开动。这时候,又是我们的同学极力把群众挡开,汽车才能缓慢地前进。

周总理的汽车开进中国大使馆的院子以后,院门外仍聚集着许多华侨,他们都盼望能够看到来自祖国的亲人而不愿离去。为了安全,大使馆的院门一直关闭着。然而过了一会儿,大使馆的院门忽然打开了,我看到周总理站着微笑地向大家挥手致意。第二天上午,周总理离开雅加达到万隆,准备出席亚非会议。保卫工作转由万隆市华侨组成的支援委员会负责。

亚非会议闭幕后,周总理又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邀请,继续在雅加达参观访问。其中一项活动是周总理和苏加诺总统共同乘坐一辆敞篷汽车游览市容。我们再次组织华校师生参加保卫工作。我记得我们是在草埔(Glodok)区迎接周总理的车队到来。草埔附近的班芝兰街(Pancoran)是当时华侨商店集中的地方。在它附近的槟榔社(Pinangsia)则是一些贫苦华侨的聚居区。当时,雅加达的自来水供应不足,草埔一带的人家需要用抽水机把自来水抽上来。当车队到达草埔的时候,自然又吸引了许多侨胞们前来欢迎,车队甚至一度受阻而无法通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位年老的华侨挑着一担水向着周总理乘坐汽车的方向走来。他走到汽车旁边的时

候,立即把水桶放下,向周总理伸出了右手。而总理也立即俯身握住了他的手。这时候,汽车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当时,我们对周总理的安全真是捏了一把汗。但是,周总理仍然十分镇定自若。这个情景至今仍然深深铭刻在我的脑中。

亚非会议后,周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侨拥有双重国籍这一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问题。由于当时不少华侨还保留着“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对中国政府的这一新政策还不十分理解。有些老华侨甚至为此伤感落泪。周总理深切了解华侨的处境和心情。

他召开了各界华侨代表的座谈会,耐心细致地反复解释中国政府废除双重国籍政策的出发点,说明这一政策是符合海外华侨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的。后来,周总理又在其他场合多次表示,这一政策同样适用于华侨居住的其他国家。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一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具有历史远见的。

欢迎周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工作,是在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领导下进行的。我们负责的保卫工作只能在暗中进行。实际上,早在周总理到达之前,我们曾经对中国大使馆周围的住户进行过详细的调查了解,以确保安全。在飞机场外夹道欢迎的同学中,最外层的同学都必须面向外侧,以便观察周围情况。他们看不到周总理的车队,但都毫无怨言。多年后,当时曾被分配站在最外层的同学还清楚记得这件事。他自豪地对我说,当时如果真发现有人企图行凶,他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这句话,使我十分感动。我们当年的工作并不是徒劳的。

亚非会议结束后,我和黄天美终于获准回国升学,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全文完